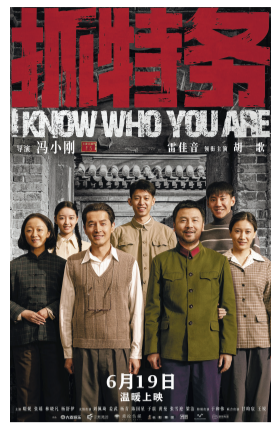


# 张策“无悔追踪”三十四年



电影《抓特务》海报

记者 何玉新

1992年,张策的中篇小说《无悔追踪》发表后,以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与社会生活碰撞的深刻内涵,在文学界引起反响。小说中,肖大力和冯静波这对纠缠了四十年的“冤家”,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能立得住的、令读者耳目一新并印象深刻的典型人物。

1995年,由尹力执导,史建全编剧,刘佩琦、王志文等主演的电视剧《无悔追踪》播出。这部电视剧几经沉浮,目前在豆瓣仍保持着9.4分的高分。2024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无悔追踪》搬上话剧舞台,由唐烨执导,刘锦云编剧,定名为《永定门里》。今年6月19日,由冯小刚执导,史建全编剧,雷佳音、胡歌等主演,改编自小说《无悔追踪》的电影《抓特务》上映。

## 派出所老所长讲的故事 成为《无悔追踪》的“魂”

电影《抓特务》终于上映,张策说,此时此刻的心情,只能用“平静”两个字来形容。“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作,起伏过的心绪终会归于平复。而且,岁月荏苒,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太多也太重,终究会让人沉稳下来的。此时唯一的想法,是要感谢影片的编导们,是他们的努力,让这个警察与特务的故事终于有血有肉地呈现在大银幕上。”

张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北京,这个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厚,且有极大包容性的都城,为他的人生贴上了一个标签。

他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代人民警察。他从小在公安机关大院里跑来跑去,父辈们出警办案是他最熟悉的场面。而且,和普通群众眼里的警察不同,在他的视角里,他们很少威严,更多的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普通,也会闲聊,也会打闹,也会闹情绪,有隔阂,甚至有些大大小小的缺点、毛病。

在张策高中毕业时,上山下乡运动还未结束,高考也未恢复,他因特殊原因没有下乡,被分配到一家著名的博物馆做水暖维修工。“博物馆浓厚的文化氛围,当然对我有影响,它使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当时年轻气盛的我,总觉得那里有一种陈腐的味道,我会从很多人的眼神里,言谈中察觉到一种不经意的轻视。这些人其实也是普通人,不过是做了比我这个维修工仿佛层次要高一些的工作。这让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窥见了人性的另一面,从另一个角

度促使我更加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回忆过往,张策觉得,也许当年的自己还是幼稚的,想法难免偏激,但初次步入社会的印象和感悟,总会潜移默化烙在一生的记忆之中。所以时至今日,他仍然会对来家里维修水电的物业工人客气有加,因为他对这些普通劳动者始终怀有一种亲切感。

1976年,张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那篇作品幼稚生涩,但字里行间也不乏初生牛犊的自信。1979年,他调入公安机关从事宣传文化工作,开启了一片新天地。

穿上警服之后,他更深切地体会到警察作为普通人,却因为职业的限制和责任的压力而变得“不普通”的那种状态,以及他们在其间的牺牲和奉献。他们的工作职能不同,但都秉承着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职业操守。“我不能不为他们书写,不能不为他们歌唱,因为我始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张策说。

常有人问张策,《无悔追踪》的故事是否有原型?在他心里,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他接触最多的,当然就是那些在基层工作的普通民警。这些活生生的人,无疑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也让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如果把他们的这种秉承、这种恪守,放大到历史的长河里,那应该是怎样的悲壮?一种似乎属于特定职业的品格,是否可以放大为人性的某种特质?

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派出所所长的前辈,给张策讲过一件事。当年,前辈管辖的胡同里住着一个单身汉,这人见到他时会往路边靠,有一个似乎不经意的立正动作。这个微小的细节引起前辈的怀疑,却始终没能查清这个人的底细,这成了他一生的心结。这个构不成故事的情节,被张策写进了《无悔追踪》,成为这篇小说的“胆”,成为故事的“魂”。

“如果说原型,这是小说中唯一真实的原型,但它却发散成了悲欢,拓展成了时代,也诠释了忠诚的主题。这个主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坚守,对认准的目标永不放弃的甚至可以称之为‘轴’的坚持精神。”张策说。

另外,他从小生活的胡同里,街坊邻居给了他一种带着烟火气的亲切感。即使那个蹬着平板车送蜂窝煤和冬储大白菜的智力障碍小伙儿,至今依然鲜活地停留在他的记忆里。所以他笔下的老北京城才那么地生动自然。

## “小人物”的喜怒哀乐 在时代洪流中浮沉

回顾小说《无悔追踪》演变成电视剧、话剧,直至今天的电影《抓特务》的过程,张策惊奇而欣慰地发现,警察职业的坚守,竟也贯穿了编导者们三十多年的时空岁月。是受到了作品的感染,还是他们自身的努力丰富了这种精神的内涵?这恐怕难以说清。但这让他坚信,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总是要坚守一种信念和一种力量的。

今天回头再看小说《无悔追踪》,张策坦言,“显得还是有点单薄了”。最初他也是想写成一部作品的,但力有不逮,最终还是写成了一“篇”小说。他解释:“当时我对公安工作的深刻内涵还是认识不够,如何用文学形式来表现这条战线和这群人,也尚在摸索之中。

好在,我粗浅地表达出了坚守的意义,这意义在公安战线,在任何一个职业领域,在任何一个阶段人生中,都是值得去做的。对‘坚守’的这种坚守,是我的创作主题,也是我的人生理念。”

20世纪90年代,《无悔追踪》电视剧播出后,张策又写过若干篇以“无”字为标志的作品,如《无梦生涯》《无花季节》《无歌之夜》《无愧英雄》等,有评论称之为张策的“无字系列”,也有人问他,这个“无”字蕴含了什么意义。在他看来,这并不难理解,“任何的坚守与奋斗,都不见得会有圆满的结局,其意义就在于,或者更极端地说,只在于坚守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有时也是残酷的,失去的常常比得到的更多,或在某些人眼里会更有价值。”他以《无悔追踪》为例,“最终,派出所民警肖大力也没能将以教员身份做掩护的潜伏特务冯静波绳之以法。一个‘无’字,我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悲壮的遗憾。但这种遗憾,一定会换来更重要的意义。冯静波最终的忏悔,已经说明了一切。”

在张策的作品里,无论是公安题材还是非公安题材,主人公往往都是“小人物”,他所关注和书写的,往往都是这些“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反映的都是他们在时代与社会的洪流中的起起伏伏。最典型的就是《无悔追踪》里肖大力和冯静波的纠缠。

对此张策解释,所谓“小人物”,恰恰是反映时代变迁历史更迭的最好镜像。“小人物的生活被时代左右,被历史牵引。肖大力其实已经有几次都摸到了冯静波的疑点,但突然发生的某些变化,往往会让这个疑点重新模糊起来,一切回到原点。这些突然的变化,往往是历史洪流的一次峰回路转,一次山重水复。小人物的坚守,正是在这种波澜壮阔中才更显珍贵,那必然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对“小人物”的书写,在张策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逐渐变得成熟与坚定。从不自觉到自觉,从模糊认识到形成思维体系,他在其间成长,也在其间经历了痛苦、迷惘和快乐。

他说:“我的写作生涯其实是很艰难的。我始终是个业余作者,在职时从来没有因创作请过假。我甚至习惯了在会议的主席台上随手记下突如其来的感悟,习惯了零敲碎打的写作方式。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人与事,给予了我有益的启迪和感动,让我的创作坚持了下来。”

## 走过漫长岁月 完成艺术蜕变

当年,《无悔追踪》小说问世后,最早找到张策谈电视剧改编的,是王朔和冯小刚。他们提出想让张策当编剧,但被婉拒,“一是我本职工作比较繁复,走不开,更重要的是,自知对影视创作不熟悉,又感觉到小说文本其实不够厚重,改电视剧必然要填充许多影视化情节,这对我来说是个艰巨的任务。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在公安机关工作,固然有大量的创作素材,但如何取舍,如何切入,走出公安文学的创新之路,于我来说还在探索之中。”《无悔追踪》虽然开了个好头,但更明确的路径仍不清晰,他很想看看更有创作经验的作家编导们,是如何诠释和丰满这个故事的。”

最终,电视剧《无悔追踪》的编剧选了史建全,他后来也是电影《抓特务》的编剧。作为北京南城长大的“老北京”,他调动了他全部的生活积累,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铺排、语言调动,都做到了准确、鲜活。“他的剧本得到了最高好评——‘可以一字不改就投入拍摄’。他和我在创作期间有过多次交流,我们也因此成为挚友。”张策说,“那时冯小刚导演也对电视剧的剧本创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虽然他因故没去担任导演,但他前期所做的工作还是功不可没的。”

电视剧《无悔追踪》在尹力导演和全体演职员的共同努力下成为经典,张策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有了些心得,对于我以后的创作,特别是影视作品创作大有益处。”



张策

著名作家,1956年出生,北京人,长期在公安系统工作。作品多聚焦警察生活与侦探题材,代表作有《无悔追踪》《血色风筝》《刑警队》《警察生活录》《无梦生涯》等。

2009年,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张和平派人找到张策,谈话剧《无悔追踪》。“张院长的设想是打造一部‘明星版’话剧,男主角预定两位当时的一线明星,计划中导演人选是冯小刚。这时我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冯导仍然把《无悔追踪》放在心上。这让我非常感动。”张策说。

任何文艺作品创作的过程都会充满不确定因素。这部话剧由著名编剧刘锦云先生执笔,直至2024年5月才搬上舞台。导演当然已经不是冯小刚,而是北京人艺著名导演唐烨,演员多是年轻面孔,剧名也已改成北京地域特征更鲜明的《永定门里》。令人唏嘘的是,刘锦云先生于同年6月逝世,《永定门里》成为他的最后一部话剧作品。

“这时,电影《抓特务》正在紧张地创作中。也是到此时,我才理解了冯小刚导演对这个故事的执着,这种对艺术、对信念的执着,和剧中人肖大力的执着异曲同工。”张策感慨说。

从小说《无悔追踪》到电视剧《无悔追踪》,到话剧《永定门里》,再到电影《抓特务》,这部作品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蜕变过程。“冯小刚曾跟我开玩笑说,你是始作俑者。我倒觉得,这是一个书写者的骄傲,一个书写者,能在写作生涯里留下一部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作品,就像在浩瀚的天际里划过一颗流星,也不算虚度。”张策说,他坚信真正来自生活、反映时代、讴歌人性精神的作品,终将得到读者和观众的厚爱,也终将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 对话张策 像警察肖大力那样 “一根筋”坚持到底

记者:您有没有创作宝典、技巧或者感悟,分享给年轻写作者,让他们迅速领悟并提升?

张策:如果有后来者问我写作的体会是什么?或者问我有什么“金句”留给年轻人?我要说,就是坚持,还有坚持中的思考。坦白说,文学天赋“爆棚”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文学爱好者,都和我一样有才情而不足,有激情而不够,有志向而被种种世事所拖累。其实一路走来,见过太多的朋友放弃了,半途而废了,其中有些朋友甚至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惜当然可惜,但我理解,在如此纷繁喧嚣的世界上,人可以有不同选择,用俗话说,不应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如果你下定决心此生奉献给文学,那么你就只有锲而不舍,只有虽死无悔,只能像警察肖大力那样,坚持再坚持,“一根筋”坚持到底。再强调的是,这种坚持是要有信念做基础的,是要做好牺牲许多东西的准备的。如果仅仅是追名逐利,是不可能在这条其实艰难的路上走到底的。

记者: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到底?

张策:一是要思考坚持的意义,我为什么要写作?这是一个灵魂拷问。二是要思考坚持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体裁更适合自己?三是要不断地创新,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更多、更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提高、调整、完善自己。

记者:在读者的印象中,您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警察,您还写过其他类型的小说吗?

张策:我自己写的作品大多是公安题材,当然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生活。但是我也写过不少非公安题材的作品,比如有一段时间,我集中写过一批二线建设题材的作品,结果出版了小说集《青花瓷》。退休之后,我突然发奇想,准备构思一批中老年情感题材的作品。大概是因为自己也已步入老年,开始侧重于老年群体,开始思考人生的最后阶段。写作是需要思想活跃的,而活跃的思想可以促进写作,也充实人生。

这种变化,和我所说的坚持并不矛盾。我仍然坚持写小人物的,坚持关注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坚持把自己融入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个小人物,虽然会写些文字,但不过如此。我更加知道,我们的时代,就是小人物创造的;我们的国家,有着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他们是坚定的基石。小人物的信念和奋斗,永远值得文学去描述,去歌唱。

记者: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您有没有特别的人生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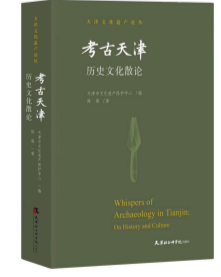
张策:今年我已经满70岁了。过去讲人生七十古来稀,这话如今已经过时。今天的70岁,不过是人生的一个台阶而已,前面还有路要走的。我这一生,也许用我作品的名字来形容最贴切,那就是——无悔追踪。

(图片由张策提供)

## 讲述

### 考古学家陈雍推新著《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

## 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封面

文 穆森

考古学家陈雍的新著《考古天津:历史文化散论》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他将此书归纳为“一个考古者对天津这座城市历史、空间与文化认知过程的记录”。陈雍1943年出生,出版有《说说考古》《考古何为》等专著。他曾多次到天津卫故城等重要遗址现场指导发掘与保护论证工作,相关发掘为国内“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提供了重要案例。

### 研究地域遗存 解读历史文化

陈雍的考古学术生涯始于1973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73年至1990年,他在吉林大学学习考古,从事考古教学;1990年至今,回到天津

从事考古工作和考古研究。半个多世纪的淬炼,他走出了一条从理论中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架构的治学之路。他的学术视野和格局以考古学为纲,却又不仅限于考古。

陈雍以“问津”“访山”“探河”“寻城”“踏海”五大章节来构建《考古天津》。动词+空间单元这样的体例设置,强调的是考古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实践特征,旨在用考古学实践成果揭示人地关系演化,呈现天津独特的城市文化生态。

作为全书的导引,陈雍将“问津”视为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经的文化自觉。1998年,他在《天津寻根——天津考古四十年特展纪略》中写道:“多少年来,天津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几乎成为包括许多天津人在内的普遍看法。”天津人在思考今后要到哪里去时,联想过去从哪里来。”他在本书中回顾了天津考古七十余年的历程,从被认为无古可考的退海之地,到构筑起十万年以来先民适应环境的历史,千年以来城市形成发展的历史,百年以来城市近代化和革命斗争的历史,正是在这种文化自觉与考古实践的相互催生中完成的。

面对不同的命题,陈雍会将考古学置于更大的思维空间中。在上一部

著作《考古何为》中,他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特色考古学建设;构思《考古天津》时,他坦言:“需要打通考古学与人类学,更需要贯通理论与实践,最终实现阐释与保护。”若把《考古天津》当成天津历史文化的镜像,那么,人类学就是镜,考古学则是像,陈雍是在透过人类学的镜来看考古学的像。他说:“人类学研究的是‘现在人’,考古学研究的是‘过去人’。‘过去人’不存在了,考古学只能通过‘过去人’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去研究他们。”

业内常有人称陈雍为“老顽童”。他的思维很活跃,一切与考古学有联系的,都愿意探索。如在李响明清家族墓地的研究中,他提出的天津人来源及方言等问题,思维触角显然已接近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新人学观点。以接受美学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有了“我者”和“他者”意识的介入,才强化了考古学的张力,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探索性。

### 将考古研究成果 应用于保护实践

倘若中国考古学界如金庸小说般有门派,那“老顽童”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考古遗产派”高手。《考古天津》

讲的是天津的考古遗产,对天津考古实践成果的认知、保护及利用。陈雍的知与行,与他的老师张忠培等前辈考古学家一脉相承,是要把考古工作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来。

“考古者不仅发现与研究考古遗产,而且保护考古遗产,保护考古遗产是考古者的历史责任。”他讲蓟州朝阳洞旧石器洞穴遗址、摩崖石刻、多宝佛塔,讲盘山、长城,都将其置于考古遗产视角下;他讲大运河遗产、明清海防遗产,也都紧紧围绕保护考古遗产展开。陈雍说,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构想的,天津考古“上山下海”。

天妃宫遗址是天津城市重要原生动点的标志。在书中,陈雍首次回顾了遗址从发现到发掘、再到保护的整个过程。《回忆天妃宫遗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更像是一篇“记者”陈雍从保护现场发来的“考古遗产诞生记”,因而具有一定的公共考古价值。

陈雍是在用考古实证精神去发现天津,守护天津。在《考古天津》中,不仅有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天津”,还有用考古眼光看到的天津。面对推土机,他对铃铛阁王家大院开展抢救性调查研究,这是“天津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建筑……对于研究古代天津城市与早期浙籍移民社区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价值”。在回顾甲骨文发现辨识重要坐标点马家店遗址的发现和保护的艰难历程时,他说,要再次呼吁加强马家店遗址保护,尽快实现遗址的科学展示与合理利用。

“建设天津考古博物馆体系”是陈雍作为一个天津老考古人的愿景。他设想,以“山、河、城、海”为核心空间单元,全面建设天津现有的考古遗产和博物馆,整合主题鲜明、点

面结合的“一总馆+四主题馆区(天津城馆区、燕山馆区、大运河馆区、渤海馆区)”,实现保护与展示、研究与教育、旅游与文化传播的核心功能。

### 为城市梳理出 完整叙事逻辑

陈雍认为,城市是文化的产物。天津文化由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与津派文化三个基本单元构成。如果把天津文化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树根植人“历史”,提供养分;树干长在“地域”,布满水土的斑痕;树叶呈现“津派”,不断长出新叶,结出果实。”此三元文化结构的物质集成,最核心、最典型的体现,就是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天津。

对于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生前曾一再叮嘱:天津要立足整体保护,地上地下、长城运河,还有海河,都要纳入保护体系。找准历史的文脉,要在城市格局上体现出源流,然后再谈风貌保护,才能纲举目张。近代百年从哪儿来?是古今中谁碰撞出来的。这点天津最具代表性。不能厚此薄彼,嫌贫爱富。《考古天津》中的“津”,是指天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山、河、城、海”,则是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骨架,见证了城市的成长。山与海拱卫城市,河与城孕育城市,正如陈雍在评价白俊峰、尹承龙的《河城互动视角下的海河历史文化》一文时所说:“天津城市因河而生,依河而建,治河而安,用河而繁。在河与城互动中形成的海河历史文化,它的根深植在天津城。”

陈雍的“寻城”之旅包括三个维度:将以天妃宫遗址为核心的大直沽作为天津城市原生动点,将天津卫城作为天津建城的标志点,将天津传统城区作为天

津城市的生发点。他提出,天津卫故城遗址应作为天津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要归回到天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故居”中。他写下《城兮归来——天津卫故城遗址考古的重要意义》一文,以人类学的视角阐释考古遗产的价值,从建城与修城,写到拆城与毁城,再到筑城与护城,跨越600余年,宛如一部天津城市命运的纪录片,一唱三叹!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陈雍曾用“寤寐不宁”来表达自己对城市保护的关切。在《考古天津》中,他时常会在文章中加上一段段按语,用以强调为什么要保护,如何保护等关键问题。如在《天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的几个问题》中,他通过正文和按语的组合,既指明了天子津渡遗址公园等建设对遗址真实性、环境真实性、知识层面真实性造成的误读,及蓟州北齐长城和“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的传说是为旅游设计出的噱头,又进一步提出建议:用“文化”替换“遗址”,改为“天子津渡文化公园”。

在完成《考古天津》的写作后,陈雍写下了一段布莱希特戏剧般的旁白——城市的记忆深藏在遗址里,考古者从中唤醒“过去”,让考古发现成为鲜活的遗产。这份遗产,是城市的魂魄,既塑造着当下,也孕育着未来。我们今日的探寻与守护,是为了将文明的火种与选择的权利,传递给后人。考古,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

我们需要这样的接力,因为这座城市还在生生不息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名城就像一部承载天津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津派文化研究的物质载体,须倍加呵护!陈雍希望能用考古书写出“天津人从哪里来,天津文化从哪里来,天津城市从哪里来”,为城市梳理出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完整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